

韩 礼 德 文 集 （ 七 ）

英语语言研究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英] 韩礼德 著

何 伟 等 译

卫真道 原编 / 彭宣维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韩礼德文集（七）

英语语言研究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英] 韩礼德 著

何 伟 何中清 高生文 马瑞芝 译

卫真道 原编／彭宣维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147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语语言研究 / (英) 韩礼德 (Halliday, M.A.K.) 著; 何伟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4
(韩礼德文集)
ISBN 978-7-301-25629-9

I. ①英… II. ①韩… ②何… III. ①英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9455 号

书 名	英语语言研究
著作责任者	[英] 韩礼德 著 何 伟 等译
责任编辑	郝妮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629-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7.5 印张 450 千字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项目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英语语言文学重点学科项目成果

《韩礼德文集》汉译编委会

顾问委员会

韩礼德(M. A. K. Halliday, 悉尼大学)

胡壮麟(北京大学)

韩茹凯(R. Hasan, 麦考莱大学)

卫真道(J. Webster, 香港城市大学)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

任绍曾(浙江大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黄国文(中山大学)

程晓堂(北京师范大学)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列)

常晨光(中山大学)

方 琰(清华大学)

封宗信(清华大学)

高彦梅(北京大学)

何 伟(北京科技大学)

胡壮麟(北京大学)

黄国文(中山大学)

姜望琪(北京大学)

李战子(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林允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承宇(西南大学)

刘世生(清华大学)

刘世铸(山东大学)

苗兴伟(北京师范大学)

潘章仙(浙江工商大学)

孙迎晖(北京师范大学)

王振华(上海交通大学)

向明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严世清(苏州外包学院)

杨炳钧(上海交通大学)

杨国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杨 敏(中国人民大学)

杨信彰(厦门大学)

杨雪燕(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 忠(东北师范大学)

于 晖(北京师范大学)

张德禄(同济大学)

张克定(河南大学)

朱永生(复旦大学)

主 编 彭宣维(北京师范大学)

副主编 何中清(北京科技大学)

于 丽(黑龙江大学)

鸣 谢

本卷由英国 Bloomsbury 友好授权翻译并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1—3. 英语及物性与主位札记,第 1—3 部分(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s 1—3),初刊于 *Journal of Linguistics* 第 3 卷第 1 期第 37—81 页,第 3 期第 199—244 页,1968 年第 4 期第 153—308 页,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友好授权翻译出版。

4. 从英语的情态与语气看语言功能的多样性(Functional Diversity in Language, as Seen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Modality and Mood in English),初刊于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杂志第 6 卷第 3 期第 322—361 页。获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友好授权翻译出版。

5. 关于正在教学之中(On Being Teaching),选自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和 Jan Svartvik 主编的 *Studies in English Linguistics: For Randolph Quirk* 文集,1980 年 Longman 出版,由 Pearson 教育有限公司友好授权翻译出版。

6. 它是一种固定词序的语言——英语(It's a Fixed Word

Order Language is English), 初刊于 1985 年 *IT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第 67—68 期第 91—110 页, 由 Leuven 大学语言学系友好授权翻译出版。

7. 英语中的声调(The Tones of English), 初刊于 1963 年《语言学大资料库》(*Archivum Linguisticum*) 第 15 卷第 1 期第 1—28 页, 由 Continuum 友好授权翻译出版。

8. 英语语法中的语调(Intonation in English Grammar), 初版于 1963 年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第 143—149 页, 由 Blackwell 友好授权翻译出版。

9. 作为话语资源的英语语调(English Intonation as a Resource for Discourse), 初刊于 1985 年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Arthur Delbridge: Beitrage Zur Phonetic und Linguistik* 48 第 111—117 页, 德国汉堡 Helmut Buske 出版集团出版。

10. “老师教学生英语”: 一篇应用语言学文章(*The Teacher Taught the Student English':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初刊于 Peter A. Reich 主编的 *The Second LACUS Forum* 1975 第 344—349 页, 1976 年由哥伦比亚 Hornbeam 出版, 获加拿大和美国语言学协会友好授权翻译出版。

11. 关于“疼痛”的语法(On the Grammar of Pain), 初刊于 1998 年 *Functions of Language* 杂志第 5 卷第 1 期第 1—32 页, 获 John Benjamins 友好授权翻译出版。

韩礼德教授前言

我的作品被译成汉语,用汉语来出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高兴——也是十分荣幸的事。我感谢那些参与这一事业的同道,特别是彭宣维教授,他发起这一项目,并最终完成。

把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使读者群大大增加。即便是那些能够流利阅读英语的读者——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多——用自己的母语来阅读,也会觉得容易得多,也放松得多;我想,能够在放松状态下阅读这些论文很重要。的确,我明白我的一些东西读起来难于消化——至少有人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承认我早期的一些东西浓缩度高,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在这方面要好一些。我曾经对我说英语的学生讲:如果你发现我的东西难读,那就大声读出来。这个办法很奏效,因为我总是在写作的时候让语篇的声响穿过我的头脑。曾经有人说,由于汉语书写特性的缘故,中文读者读东西的时候是基于语素而不是音素或音节的;他们读东西从来就没有“声音”进入;但奥维德·曾(Oivd Tseng)在几年前对此进行了反驳,他发现,即便面对汉字,读者在处理语音时也会出现短暂的间歇。我觉得,当你阅读一种外语时,不管多么流畅,也很难听到语篇韵律和语

调随着阅读而随你移动。韵律和语调同时对书写下来的词义做出贡献——这对译者来说总是一件麻烦事！所以，一旦我的论文译成汉语、摆到那些对语言学感兴趣、而遇到英语又没那么自在的中国读者面前时，我希望译文会让他们觉得更亲近，也更愿意研习。

但还有一个令我如此由衷地接受这些论文译成汉语的原因，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自己走上的语言学学术之路，以及我在研究中确立的方向。当我第一次学习语言学时，那是 20 世纪中叶，大多数欧洲和北美研究语言学的人，都是经由印欧语言的途径开始语言研究的，而印欧语的语言学学术传统主要是基于带有复杂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事实上，这也是语言学首先赖以产生的出发点，因为早期的学者在于探究对词形变化的解释。例外的情况却是汉语；汉语语言学家研究音韵学，发展出了一个词汇研究的丰富传统，包括众所周知的最早的词义汇编，但他们没有涉及语法。鉴于汉语在形态方面没有变化，或者至少到周朝和汉代时期不再有词形变化，关于语法的同类问题就完全没有出现。

我在中学时期学习过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有些勉为其难，因为这些语言人们不再说了，所以我们得通过阅读来学习。如今，尽管我总是乐于阅读相关东西，但基本上是一个依靠耳朵的学习者；我只能通过倾听人们说出的话来学习一门外语。所以，当离开中学开始学习汉语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时，当然我没有学习语言学的意识。但当我几年后来到中国学习时，我被引入语言学，有幸先跟随罗常培、然后是王力研究汉语；所以我经由汉语研究进入语言学的学术之路，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学习历史语言学的原始材料是汉藏语，而非印欧语；作为描写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英语（或拉丁语），而是汉语。

描写汉语语法，你可能一开始就要“从上往下”看——从语义的角度开始，或者说从意义开始。当然，你还得“从下往上”看，考察表达那些意义的类型；不管是哪一种语言，这两个角度最终必须协调，得确立一个出发点。但通过研究汉语来走进语法意味着一开始你就得摆脱结构的束缚（带有“显性”关系）、试着把你的描述植根于系统里（带有“隐性”关系），便于敏锐地从任何形式的差异背后找出相同的类型。当然，这样的隐性特

点类型是每一种语言的特点,汉语也不例外;但如果你不为杂乱的形态复杂性分心的话,还是很容易入手思考的。

而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期,我放弃了汉语研究(有些遗憾),把注意力转向了英语,但仍然有15年学习和教授汉语的经验伴随着我。当我第一次在英格兰的“语文学会”做讲座时,我的主题是“现代汉语的语法范畴”;在几年以后的另一个场合,当我在那儿谈论英语时,尤热妮·亨德森(Eugénie Henderson)教授问我:我研究英语是否曾受我研究汉语的影响。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充满了同情;她非常善良,也是东南亚语言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我承认这种可能性;但我补充道:英语跟汉语在某些有趣的方面很相像。

任何人“做语言学”的经历,总是会被他们的研究领域打上他们如何进入这一领域的烙印;我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点。同时,我倾向于认为,这一点具有潜在的力量源泉,而不是羁绊。对于我来说,做一名语言学者意味着,你把语言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探究来对待;我认为任何一个“做科学”的人,都带有独特的个人背景,会从方式上影响他们所解释和从事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意味着录制语料,进行描述、概括、理论化;总是要让你的眼睛(和耳朵)保持警觉,不要把事实理想化,去适应你自己特定的模型。这还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位语言学者,无论在哪里,你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把所有的功能作为首要的人类符号(意义)看待——包括非正式语域、非标准方言、混合语、聋哑人用的身势语、极端语言,以及任何通常意义上语言这个术语所指的某种语言。我们需要朝着关于意义的普通理论方向努力,它会涉及其他相关的符号(意义)系统,诸如儿童原始语言、非人类语言、所有那些表征意义的“多模态”途径。

但无论选择什么作为研究对象,我们总是要用某种语言来描述它、对它进行理论化。这就是我们的“描写语言”(language of description)。在多年前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使用了“l. o. d.”(描写语言)和“l. u. d.”(受描写语言)来指别这两个方面,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后来建议,描写任何一种语言的“规程”,描写语言应该与受描写语言相同:英语语法用英语描写,汉语语法用汉语描写,等等。(当然,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语言演化出了一套语言学语域——尽管每一种语言都有这样做的潜能。)这样

做可以为语言研究提供“知情人”视角的优势；不过，或许，与其倾向于选择一种描述，或者一种单一的方法，我们宁可接受那些内在于语言系统的互补性，对我们的描写语言进行提炼，让它作为一种元语言变得更为抽象和更为强大。

同时，描写语言通常需要翻译。呈现在这里的论文，其原初语言都是英语；它们现在被重新组织成了汉语。这在多大程度上会变动或修改相关描写？你可能会说：一点也不会。英语和汉语，作为描写语言，已经在所有的科学分支领域被广泛使用；而科学意义，不管采用什么语言来进行编码，都是一样的。可我们真能如此确定吗？假如我们注意考察每一个元功能就会发现，概念意义会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因为其所指有合理的界定——尽管即便是专业术语在不同的语言中也会有不同的语义关联体系。但人际和语篇意义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变化会很大。即使译者完全能够意识到这些其他元功能维度上的意义，也常常对同时保证三者都对应而爱莫能助，他通常首先要考虑的是概念成分，这一点在科技翻译中尤为突出。语篇意义在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特别难于处理，因为主位和信息类型很难精确对应。

如今，已经有不少语言被运用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出版物中，其中一些至今还只是译本，但不少已经同时进入了原创阶段。我明白，人们在所有这些方面付出了艰辛努力，以便维系术语选择和核心表述的一致性。麦迪逊、照屋和林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术语》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资源，尤其是在理论性术语和描写性术语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汉语译者在対等选择方面为了保持一致而特别谨慎。我当然是特别高兴看到如此之多的原初材料用汉语创作出来；但我同时十分看重翻译本身，从英语到汉语——我也希望将来是从汉语到英语。在我看来，理论可以从译者奉献的作品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翻译不仅昭示了原始语篇的意义，也输入了其他意义，这可能是作者未曾意识到的，却可以开启其他没有预料到的思想通途。

韩礼德

2014年8月31日

悉尼

胡壮麟教授序言

由香港城市大学汉语、翻译和语言学系系主任 Jonathan J. Webster 教授主编的,并由英国 Continuum 公司自 2002 年陆续出版的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共 10 卷,2007 年已全部出齐。北京大学出版社获得 Continuum 公司的授权后,该文集在中国境内的出版,无疑是我国出版界和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

就当代语言学研究来说,世纪下半叶一直表现为生成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对峙,说得具体些,乔姆斯基在 50 年代末一度以他的转换生成语法掀起一场革命、成为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语言学研究的主流时,能揭竿而起并与之抗衡的便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学派。^①如果说乔姆斯基的理论得益于后来成为他“革命”对象的美国结构主义,韩礼德则公开宣称他继承和发展了欧洲的弗斯学派、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冲突、挑战和互补推动了 20 世纪下半叶精彩纷呈的语言学研究。

^①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在中国的出版还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韩礼德的成就除了受到欧洲语言学传统的影响外,也从中国语言学传统获得滋养。韩礼德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来华求学,师从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在韩礼德的论著中不时绽放出这些大师的思想火花。^①在这个意义上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的出版是一次学术上的回归,为我国语言学研究如何实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结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充分反映了韩礼德所走过的治学道路,其轨迹分见于各卷的主要内容。韩礼德早年研究现代汉语。第8卷《汉语语言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这段经历也为韩礼德打好了音系学和方言调查的扎实基础。回英国后,韩礼德进入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从而为继承、发展和建立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奠定基础,把握前进的方向。这见之于第1卷讨论语法的16篇论文,内容涉及语言系统、结构、类和级阶,范围包括从词到篇各种语法现象。第3卷《论语言和语言学》的18篇论文,进一步从系统功能理论角度探讨语言的各个方面。为了在欧美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韩礼德在第7卷中的10篇论文把英语作为研究分析对象,也是从社会符号的角度研究语言,收录了许多已经绝版的重要文献。在研究方法上,韩礼德注意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如第4卷有关“婴幼儿的语言”的16篇论文,涉及婴幼儿和原始母语,从儿童语向成人语言的过渡,以及早期语言和学习三个部分。在这方面,韩礼德的另一贡献是将语言学研究从句子层面提高到在具体语境中出现的语篇和话语,如第2卷中的8篇论文;韩礼德还在这里探讨了语法是如何创造意义并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韩礼德特别注意语言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应用、能否说明和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并为社会服务。前者见之于第10卷的10篇有关从社会角度探讨语言的论文,后者反映于第9卷有关语言与教育以及文化关系的19篇论文。我国曾经有位学

① 胡壮麟:《王力与韩礼德》,《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第1期,第9—57页。收入张谷、王辑国编:《龙虫并雕,一代宗师——中外学者论王力》,广西教育出版社,第200—216页。

者向韩礼德提问:为什么转换生成语法在中国国内打不开局面,而系统功能语法却响应者如此众多?这两卷的内容有助于人们找到正确答案。第5卷的主题为“科学语言”,共8篇论文。在本卷中,韩礼德系统探讨了著名的语法隐喻现象,说明语法以至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来自于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观察、认识和表达。20世纪下半叶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获得飞速发展的时代。韩礼德时已进入耄耋之年,仍能关注语言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第6卷《语言的可计算性与可量化研究》的11篇论文,包括范畴的概率问题,探讨区别于他前期经典语言模式的扩展模式。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有必要指出,*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只概括了韩礼德2007年以前的主要论著和节选,因此有关韩礼德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和学习。其次,这几年韩礼德本人一直是老骥伏枥,笔耕不辍,勤于思索。2006年3月26日韩礼德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的“韩礼德语言研究智能应用中心”成立大会上,做了题目为“研究意义:建立一个适用语言学”的主旨报告。韩礼德提出适用语言学(applicable linguistics)的长期目标是为了建立语言的意义发生系统,其工作机制是以社会理据来解释和描写语义发生,可见韩礼德已经认识到语言学研究最终要解决对“意义”的描写问题。对此,结构主义和生成主义学派不很重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功能语义学方面也只是刚刚起步,因此,这将是语言学界在新世纪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

最后,谈谈本次出版的《韩礼德文集》中译本。当北京大学出版社本世纪初将*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纳入出版计划时,由于时间和力量所限,匆忙中我们只完成了对第8卷的翻译。令人高兴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彭宣维教授的倡议和组织下,将《文集》的翻译工作纳入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五年规划之一,并作为200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07BYY063)之下的一个子课题申报成功。因此,这次推出的《韩礼德文集》中译本既是全面向国内汉语界介绍韩礼德博士的研究成果,也向国内其他学习和研究语言学、哲学、教育学、符号学和所有涉及语言应用学科的师生和研究者提供了国际前沿成果的研究资料和学习资料。可以肯定,中译本的出版对港澳台地

区和国外华人学术界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项目总负责人彭宣维教授的介绍,《韩礼德文集》中译本的胜利完成有赖于国内多所高校的教授和学者的参与和负责译校工作。这里,只能列举各卷的主要负责人。

第一卷:杨炳均,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原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二卷:潘章仙,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第三卷:向明友,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四卷:高彦梅,博士,北京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副主任。

第五卷:张克定,博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六卷:刘世铸,博士,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七卷:何伟,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八卷:胡壮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九卷:刘承宇,博士,西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原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十卷:苗兴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原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可见,《韩礼德文集》中译本的出版翻译工作有赖于我国高校众多老师和研究生的积极参与。谨在此向各位译者多年来的辛勤劳动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祝贺。

胡壮麟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2014年7月末

黄国文教授序言

《韩礼德文集》(10 卷本)(*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edited by Jonathan J. Webster)2002—2007 年由英国的 Continuum 出版公司陆续出版,2007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重印了这 10 卷文集,每卷都有总序和一个中文导读。从 2006 年起,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们就开始考虑翻译这个文集,其中的第 8 卷《汉语语言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胡壮麟等译 2007)中译本已经出版了。从 2008 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宣维教授就组织了一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有志之士着手翻译《韩礼德文集》的其他 9 卷。经过 6 年的不懈努力,这个浩大工程终于竣工,可喜可贺。

《韩礼德文集》收集了韩礼德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表的重要论文,连同他的其他论文和著作一并构成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系。众所周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不断修正、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它是在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J. R. Firth)的语言学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说韩礼德是新弗斯理论(neo-Firthian theory)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但严格地说系统功能语言学不是新弗斯理论。韩礼德

早期的理论模式(如 Halliday 1961),即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实质上是个“句法理论”(a theory of syntax, 见 Fawcett 2000: xix),后来经过多维扩展,发展成了比较完整、多维的语言学理论。该语言学理论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如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如 Halliday 1966)、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如 Halliday 1967a, 1967b, 1968, 1985)、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和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如 Halliday 1978, 1985, 1994;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2014)、社会意义学(Social Semiotics, 也译“社会符号学”)(如 Halliday 1978, 2002—2007, 2013;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Matthiessen 2007)等阶段。对于目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或社会意义学,韩礼德称它既是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又是适用语言学(Applicable Linguistics);说它是普通语言学,是指这个理论模式的设计是为了描述、分析和解释人类的语言;说它是适用语言学,是指它是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理论(a problem-oriented theory),是为了解决与语言有关的一切问题来设计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除了韩礼德以外,还有很多学者与韩礼德一起,在努力检验、修正、发展、拓展、完善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体系。这个过程是“进化性的”(evolutionary),而不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因为大家的研究和讨论都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中进行的;无论是韩茹凯(Ruqaiya Hasan)、福塞特(Robin P. Fawcett)还是马丁(James R. Martin)、麦蒂森(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他们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Systemicists),他们的研究都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大框架中进行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他们的一切学术分歧,都是“内部的分歧”(见胡壮麟等 2005: 398)和内部的争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壮大,是它的学术生命力所带来的,是理论优势的表现,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因此,它完全可以与结构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相媲美,为语言研究提供另一个理论指导,另一个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另一种思路 and 路径。

作为既是普通语言学又是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结构语言学、形式语言学或其他语言学流派理论指导和研